

新时代背景下英语专业教育教学面临的困境与思考

姚 健,徐春山

(安徽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摘要]传统的英语专业教育教学在拓展国人视野,促进中西方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然而,其存在的“三重、三轻、一缺位”的结构性困境与当下国家战略需求存在鸿沟。“三重、三轻、一缺位”指的是传统外语人才培养重语言技能训练、轻高阶思维能力培养;重西方文化、轻中国文化;重过去、轻当下;跨文化传播角色的缺位。新时代英语专业教育教学的神圣使命是培养立足中国、沟通世界、具有良好的跨文化双向传播能力的外语人才。为此,其转型必须将其置于新时代背景之下,进行顶层设计,服务国家战略,调整课程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式,线上线下联动,系统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升学生跨文化传播能力。英语专业教育教学的成功转型将有助于促进中西方之间的平等互动,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

[关键词]英语专业教育;三重、三轻、一缺位;跨文化传播;中国话语体系;文化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 G642.0; H319; G64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06-0168-03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6.06.058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以虚心学习的姿态拥抱世界,积极接纳西方文化的输入。这一过程中,中国对西方文化的主动引进,加之西方在文化上的优越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直接对抗,使西方对中国的发展持相对“包容”态度,从而为我国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此期间,英语主要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经贸合作与知识引进的语言工具。郭英剑(2020)指出,这一时期外语教育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引进外国语言与文化,二是在中外文化沟通中发挥桥梁作用。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2018年以来,随着中国在科技、经济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面进步,与西方的发展差距逐步缩小,西方世界的焦虑感日益上升,贸易战、科技封锁与舆论对抗等现象频发。在此背景下,传统外语专业教育所承担的单向文化输入与商务交际功能,已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复杂需求。郭英剑(2020)还指出,外语教育应勇于承担第三项全新使命,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因此,外语专业教育的改革与转型,已成为中国与西方世界互动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必然选择。

面对新形势,英语专业教育必须重新明确其发展方向与使命。我们亟需系统回应以下关键问题:英语专业教学改革的方向何在?新形势下其核心使命是什么?当前教育中存在哪些现实困境?又应通过何种路径实现有效转型?

一、英语专业教育教学的新使命

传统英语专业教育教学主要侧重于其作为交流与沟通工具的功能性定位。然而,在当前形势下,这一模式已难以适应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双向互动与深度沟通的现实需求。新时代背景下,英语教育的作用与使命亟待重新定义:它不应再局限于单向获取外部知识的媒介,而应发展为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战略性途径。这也构成了英语专业教育教学实现内涵升级与结构转型的重要方向。

(一)立足中国,沟通世界

随着中华民族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对中国

发展的复杂情绪——包括焦虑、质疑乃至诋毁——亦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下,中国亟须与西方世界建立平等、双向的对话机制,使全球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地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英语专业教育应积极推动从“了解外国”向“传播中国”的范式转变,实现从单向接受西方文化到分析与比较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进而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之间的互鉴共融。因此,“立足中国,沟通世界”已成为英语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首要使命。

(二)服务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中国发展叙事与全球治理主张的有效传播

在全球多元文化交融与碰撞并存的语境下,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及其全球治理理念有效传播至世界,并逐步赢得理解、尊重与认同,已成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时代命题。中华文明积淀了五千年的智慧底蕴,而当代中国在脱贫攻坚、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成就同样举世瞩目。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等国际合作平台,中国正积极推动国际叙事范式从“文明冲突”转向“文明互鉴”,从“零和博弈”迈向“合作共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传播影响力、文化感召力与国家形象亲和力。吴岩(2019)也指出,外语教育应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作为连接中外的语言桥梁,英语教育必须肩负起传播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阐释全球治理主张的新时代使命,推动中国与世界在平等基础上实现文明对话与共同发展,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持续而深远的动力。

二、英语专业教育教学面临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英语专业教育为我国对外开放和跨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然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互

收稿日期:2025-10-2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安徽省重点教学研究资助课题“新文科背景下基于传播理念的英语写作课程改革与实践”(项目编号:2022jyxm297);安徽省重大教学研究资助课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教材‘三进’的机制、路径、效果评价研究”(项目编号:2023jyxm04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姚健(1979—),男,安徽肥东人,安徽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二语习得、英语写作教学研究。

动关系呈现出全新态势,英语专业教育体系中的结构性问题也日益凸显。

(一)重语言技能训练,轻思辨能力培养

英语专业教育长期将教学重点放在听、说、读、写、译等基础语言技能的训练上。以我校英语专业培养方案为例,核心课程模块共设25门课程(总计57学分),其中语言技能类课程达20门(47学分),分别占比80%和82%。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课程的评价标准多局限于语法正确性与表达流畅度,而对内容的深度挖掘、思辨能力的培养以及价值观的塑造等方面缺乏有效评价机制。课程设计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的要求存在明显差距。指南强调应培养学生“勤学好问,相信理性……能对证据、概念等进行阐述、分析、评价、推理与解释;能自觉反思和调节自己的思维过程”。然而,当前教学仍停留在语言材料的表层理解,缺乏系统的思辨训练。在数字技术极大丰富学习资源和提升学习效率的今天,维持如此高比例的语言技能课程是否仍有必要,值得深入探讨。

(二)中西文化比重失衡

英语专业教育在文化内容配置上存在显著的中西失衡现象。除语言技能课程外,专业课程几乎全部围绕西方语言文学与文化设置,体系完整;而涉及中国文化的课程仅有一门《中国文化概要》,在核心课程中门数占比4%,学分占比3.5%。

教材内容同样呈现这一倾向。以广泛使用的《现代大学英语精读》为例,全套教材课文作者均来自西方国家,中国相关素材几乎空白。这种中国文化话语的“缺场”不仅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加剧了中西文化理解鸿沟。英语专业学生往往能够流畅阐述西方文化,却难以用英语有效表达中国文化内容。长期维持这种单向文化输入模式,将导致我国文化在国际交流中被边缘化的风险。

(三)教学内容滞后于时代发展

当前英语专业教育存在明显的时代脱节问题。教材内容严重滞后,所选文章最早可追溯至近70年前,最新材料也仅为2009年的演讲内容,距今已逾十五年。这些素材虽语言规范、文字优美,但普遍脱离现实社会,缺乏反映当代中外社会现实的鲜活内容。经典作品固然是语言学习的重要资源,但不应成为教学内容的全部。语言作为文化载体,兼具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维度。当前教学过度偏重历时性经典,严重忽视共时性素材,导致学生虽系统学习西方历史文化,却对当代西方社会及其话语体系感到陌生,难以建立与当下世界的有效连接。

(四)跨文化传播角色缺位

从文字学角度考察,“跨”字左从“足”,寓意实践与超越;右为“夸”,引申为相互尊重。这意味着“跨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以相互尊重为前提、以超越差异为目标的交往行为,最终追求“和而不同、和谐共融”的理想境界。然而,当前英语专业的跨文化交际课程仍偏重于引导学生单向理解和适应西方文化,缺乏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视。孙英春(2015)强调,跨文化传播的理想形态应是“对话式传播”,即在保持各自文化独立性的基础上实现平等交流。

为破解这一困境,外语教育界学者提出了重要思路。文秋芳(2022)主张通过“语言教育”与“传播教育”的有机融合,实施“双轮驱动”策略;王守仁(2019)强调在教学中融入中国元素,实现从语言技能训练到话语方式掌握的提升;何宁与王守仁(2021)提出以“传播”为基点,推动外语教育从

“了解外国”向“传播中国”转变;马洁(2023)则聚焦于构建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体系。

传统英语专业教育由于过度侧重语言技能训练而忽视思辨能力培养,加之中国内容(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的严重缺失,以及西方当代社会语料的不足,导致学生出现思辨能力薄弱、中国叙事能力欠缺、跨文化传播能力不足等多重问题。推进英语专业教育从单向输入向双向传播的范式转型,已成为支撑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实施的迫切要求。

三、英语专业教育教学转型路径

面对时代变革与跨文化传播意识不足所带来的挑战,深陷“三重、三轻、一缺位”的结构性困境的传统英语专业教育教学必须进行系统化转型与改革。这一过程需立足于新时代背景,以跨文化传播理念为指导,开展涵盖认知重构、内容更新、能力聚焦与评价创新的全方位、多层次改革实践。

(一)强化顶层设计,服务国家战略

杜链(2016)指出,顶层设计是“统筹考虑工程项目各层次和各要素,追根溯源,统揽全局,在最高层面上探求问题的解决之道”。英语专业教育教学的改革同样是一项系统工程,亟需通过顶层设计实现根本性突破。面对全球科技革命、经济格局变革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英语专业应当践行“新文科大外语”理念,超前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突出国际传播能力培养,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具体而言,应推动英语专业与传播学的深度融合,引入传播学课程体系与专业师资;开设写作学概论等课程,提升学生的言说能力;精选西方社会对中国评价的文本素材,通过比较视角促进学生知识体系的重构与创新。

(二)重构教材体系,融入中国话语

为弥补传统英语教学中中国话语体系的缺失,需对教材内容进行系统优化,实现历史与当代中国话语的有机融合。一是深化历史文化教学内涵,推动《中国文化概论》等课程从浅表介绍转向深度阐释,增强文化厚度与思想深度。二是将中国精神与文化元素自然融入各类课程,使中国话语成为语言技能训练与文学赏析的有机组成部分。三是扎实推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进”工作。胡业爽、徐曼琳等(2022)指出,该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核心命题;戴可可(2022)强调,“三进”本质上是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融合过程。四是积极引入反映当代中国实践的鲜活素材,包括社会热点、媒体话语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生动表述,增强教学的时代性与感染力。

(三)创新培养模式,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

在文化多样性并存与冲突交织的全球语境下,外语人才承担着促进文明互鉴、消解文化隔阂的重要使命。当前,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面临严峻挑战,亟需培养具备双向传播能力的高素质外语人才。

为此,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应着力于以下方面:一是强化价值引领,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二是以比较视角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通过在历时与共时维度审视中西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推动平等对话。三是系统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传播能力。王守仁(2019)强调,跨文化能力是一流外语人才的核心素养。四是加强言说能力训练,通过写作、演讲与辩论等课程,提升学生的综合表达能力。教学中应引入国际媒体与社交平台中的真实语料,例如,巴勒斯坦驻英大使应对BBC访谈的典型案例,强化在真实语境中的语言策略训练。正如王守仁(2019)所言:“跨文化交流中的责任感和思辨意识主要涉及中外文

化的交流、交锋和交融,要求我们具备批判性思维,进行比较与分析,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

此外,应积极推进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方式创新,以数字技术赋能英语专业教育转型,最终服务于国家软实力提升与文化强国建设目标。

四、结语

传统英语专业教育教长期存在的“三重、三轻”与“一缺失”的结构性困境导致了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和当下社会的需求侧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英语专业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必须立足中国与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在新语境下互动所呈现的特点,走“新文科、大外语”的路子,进行系统的综合性改革,突出学生国际传播能力的培养,通过增强学生的中国文化认同与跨文化阐释能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接受度,进而强化我国在国际场域中的话语表达能力,切实服务国家文化强国战略。

参考文献:

- [1]郭英剑.对“新文科、大外语”时代外语教育几个重大问题的思考[J].中国外语,2020,17(1):4-12.
-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交出版社,2022.
- [3]吴岩.新使命、大格局、新文科、大外语[J].外语教育

研究前沿,2019,2(2):3-7,90.

[4]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指南[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0.

[5]孙英春.跨文化交际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37.

[6]文秋芳.国际传播能力、国家话语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兼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双轮驱动”策略[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7(3):17-23.

[7]王守仁.高校外语专业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45-49,117.

[8]何宁,王守仁.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外语运用能力的培养[J].外语教学,2021(1):1-4.

[9]马洁.高校外语专业学生“讲好中国故事”能力提升路径研究[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31(3):67-72.

[10]杜链.顶层设计的思路与方法——城镇信息化战略研究[J].电子政务,2016(6):80-88.

[11]胡业爽,徐曼琳.“三进”课程的课堂教学设计路径逆向探析——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俄文版翻译鉴赏课程为例[J].外国语文,2022,38(3):25-32.

[12]戴可可.抓好“三进”培养新时代外语人才[Z].华声在线,2022-5-21.

Challenges and Reflections on English Maj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YAO Jian, XU Chun-sh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English major education has played a historic role in broadening the horizons of Chinese and promoting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owever, its inherent structural dilemma—characterized by a triple emphasis, triple neglect, and one absence—has created a significant gap with current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Specifically, this refers to an overemphasis on language skills at the expense of higher-order thinking abilities; a focus on Western culture to the detri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 preoccupation with the past while neglecting the present; and the absence of a defined role in bidirectional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sacred mission of English major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who are firmly rooted in China yet capable of bridging the global divide, possessing strong bidirectional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To achieve this, its transformation must be strategically positioned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is requires top-level design aligned with national strategies, adjustments to curriculum content, innovation in teaching methods, the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learning modalities,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and the enhancement of student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pacities. A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major education will contribute to promoting more equitabl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strengthening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glob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ey words: English major education; a triple emphasis, triple neglect, and one abse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ina's discourse system; cultural soft power

(责任编辑:范新菊)